

# 为教育而流动

## ——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

李 超 万海远 田志磊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了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下的人口迁移模式以及“为教育而流动”的迁移机制。研究显示,随迁子女教育均衡政策的出台会吸引更多外来人口流入改革省份,并且改革力度越大、对随迁子女入学的门槛要求越低、升学的限制条件越小,对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吸引力就越大。相对于其他教育均衡政策,异地高考试点对农民工流向的影响更加明显。伴随着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实施,农民工家庭的迁移距离也随之增加。为了让其子女顺利在流入地的公办学校入学,农民工父母宁愿以牺牲部分工资收入为代价来换取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工家庭的流动性。因此,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要对这种家庭式人口迁移新模式引起足够重视,在教育等公共服务政策上有针对性地进行适当调整。

关键词: 随迁子女 教育政策 迁移机制 洼地效应

作者简介: 李 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100028;

万海远(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100875;

田志磊,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00871。

中图分类号: F8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02(2018)01-0132-15

###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充分激活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在户籍制度不断弱化的背景下,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不断涌入城市并逐步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和城市建设服务的中坚力量。农民工数量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成为我国当前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助推器,另一方面也为流入地公共服务带来了严峻挑战。尤其是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催生了对教育、医疗和就业等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对城市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21世纪以来,随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口结构变迁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综合影响及应对措施研究”(15&CRK019);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点项目(17SRAL001)、北京师范大学学科交叉项目(312231104)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本文曾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6青年论坛”上进行汇报,作者感谢与会学者及匿名审稿人给予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模式逐步由个体迁移向家庭式迁移转变,农民工随迁子女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见下图)。<sup>①</sup>根据《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和《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增至1.69亿人,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数量高达1367万人,并且外出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的流动方向呈现明显的指向性特征。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是跨省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主要流入地,占全国跨省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接收总量的一半以上。总体而言,东部沿海省市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教育公共服务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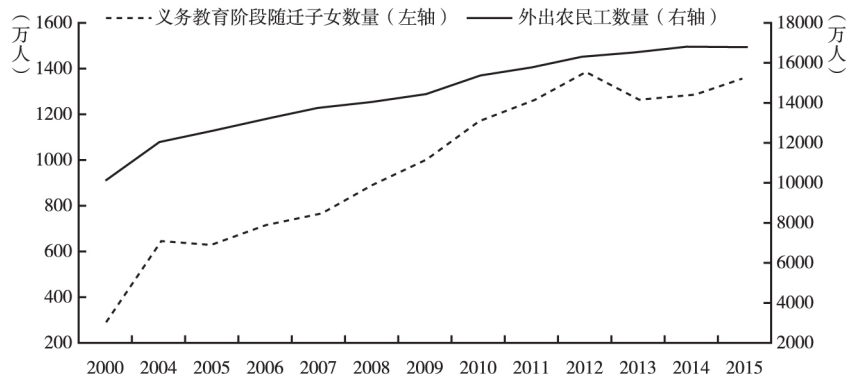


图 21 世纪以来中国外出农民工及义务教育段随迁子女数量变化趋势

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关系到上亿流动人口的切身利益,妥善解决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解决我国人力资源短缺问题以及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益的重要途径。正因为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重要性,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政策层面和管理方式创新上展开了积极探索。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政策,各地方政府对于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改观,逐渐从早期的被动应付转变为积极主动地包容接纳。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仍然有很多地方政府和学者担心,农民工在做出家庭式迁移决策的同时,是否会考虑流入地随迁子女教育均衡政策对其子女入学的影响?如果这种政策的作用机制存在,是否会导致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省市面临更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压力,出现所谓的“洼地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视角,本文主要从流动人口的相关理论出发,将随迁子女的教育均衡政策与劳动力流动机制联系起来,用微观数据来检验是否存在教育公共服务的“洼地效应”以及“为教育而流动”的迁移机制。若实证检验结论成立,那么中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要对以预期收入为主要分析框架的西方新古典迁移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并对这种家庭式人口迁移新模式引起足够重视,在教育等公共服务政策上有针对性地做出适当调整。全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研究的文献述评;第三部分为随迁子女教育均衡政策的回顾与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主要评估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对农民工家庭迁移决策的影响;第五部分检验政策改革的异质性以及“为教育而流动”的作用机制;最后是结论与对策建议。

<sup>①</sup> 2008年以后的外出农民工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2008年以前的外出农民工数据主要转引自盛来运、卢锋等人的相关论述。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人数,教育部自2010年开始进行专门统计,而2010年前的相关数据散见于国家统计局和教育部等下属职能部门,2000年和2005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数参考叶静怡、吴霓、孙红玲等学者根据对应年份人口普查和抽样数据进行的估算。

## 二、文献述评

与新古典迁移理论将迁移决策视为劳动力的独立个体行为不同,新迁移经济学理论更加强调迁移决策的家庭分享合约假设(Stark 和 Bloom, 1985),即劳动力迁移行为的发生需要综合考虑家庭收益最大化和家庭风险最小化等一系列预期、偏好和约束条件,包括家庭规模、社会网络、收支结构和邻里效应等。其中,关于教育与迁移决策的讨论被视为体现阶层流动和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方面(Xiong, 2015)。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民间便开始流传“孟母三迁”的典故,而真正将教育与迁移决策问题研究引起国际关注的是美国的高特罗(Gautreaux)项目。1967年,在高特罗领导的一群原告与芝加哥住房管理局的诉讼结束后,诞生了一项住房项目计划,其内容是安置一组家庭到教育等公共服务较好的芝加哥郊区,另一组家庭安置在教育公共服务较差的芝加哥其他地区。若干年后发现,这种公共服务差异对儿童的长期发展影响非常明显:迁移到郊区的家庭子女大学入学率为54%,而留在芝加哥的家庭子女大学入学率仅为21%;若仅考虑四年制大学,两组家庭子女的入学率分别为27%和4%(Rosenbaum, 1995)。作为高特罗项目的拓展,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进行了一项更为宏大的实验计划——向机会迁移的示范(Moving to Opportunity Demonstration, MTO)(Sampson, 2008)。自1994年以来,这一计划开始在巴尔的摩、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和纽约等五座城市展开。实验研究表明,迁移家庭的儿童行为问题指数比对照组降低了30%(Katz等, 2001),8岁左右儿童的预期人生收入显著增加30.2万美元(Chetty等, 2016)。男孩的心理健康通过迁移到教育公共服务更优质的地区而获得很大改善(Leventhal和Brooks-Gunn, 2002),并且从高贫困社区迁移到低贫困社区的少年暴力犯罪率降低了大约30%~50%(Ludwig等, 2001)。更有意义的是,关于MTO项目的后续系列研究中,并未发现对搬迁家庭中13岁到18岁之间的青少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sup>①</sup>,对成年人的收入和福利影响也微乎其微(亨德森、蒂斯, 2012; Chetty等, 2016)。综合MTO项目的系列研究来看,政府积极鼓励低收入家庭搬迁到收入和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社区,对于青少年的长远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这一因果关系并不因迁移儿童的性别、种族而发生变化。

由于各国国情有别,关于教育与迁移决策的相关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Roy等, 2015)。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南南合作局在2006年进行的系列案例研究显示,迁移家庭的随迁子女更有可能承担过多的家务劳动,面临更多的社会排斥和街头暴力风险(UNICEF和SU-SSC, 2006)。这种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严重,如印度每年因干旱等自然灾害导致的流动儿童就多达400万~600万人(Smita, 2008; ILO和UCW, 2010),其中大多数被迫离开学校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Roy等, 2015)。Das和Das(2014)对印度特里普拉邦的调查显示,虽然随迁子女的教育状况在迁移后得到改善,但由于流入地城市的生活成本非常高,使得他们无法在优质学校入学并享用充足的教学设施。其他有关摩尔多瓦以及加勒比地区的研究也表明,随迁子女的学习成绩和幸福感在迁移后会出现显著下降,而辍学率和成为童工的概率大幅上升(Vladicescu等, 2008; Bakker等, 2009)。但是,关于菲律宾的调查研究却出现了另外一种境况,由于外出务工显著改善了家庭的收入状况,从而使其子女有更多入读私立学校和参与课外活动的机会(Scalabrini Migration Center,

<sup>①</sup>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13岁后的青少年性格已经开始成型,搬家会中断他们既有的社交和生活方式,这种负面影响会抵消居住环境所带来的正面影响。

2004)。与上述国家相比,由于中国出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政策,受父母迁移行为而导致的随迁子女辍学率要相对较低,因此对教育均衡政策的争议主要体现在户籍制度及其衍生出的公办学校入学门槛上(Li 等 2015;Zhang 2015)。Xu 等(2013)认为,虽然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属地原则已经明晰,但是教育均衡政策仅对少数高收入和高教育程度的外来人口家庭有效,仍有很多非教育壁垒限制了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公办学校接受教育。Chen 和 Feng(2013)对上海市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公办学校的软硬件设施和教学质量要明显高于农民工子弟学校,因此提高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公办学校入学率是解决教育均衡问题的关键。Xiong(2015)通过对存在于公办学校的“天花板效应”以及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反学校文化”进行分析,认为现行的教育体系不但很难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并且进一步强化了嵌入在制度体系中的不平等。

既然教育因素在迁移决策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是否存在为追求子女教育质量而导致的迁移行为发生? Tiebout(1956)通过模型证明,理论上只要存在地方政府和相应辖区分割,并且地方政府之间提供差异化的公共产品,那么对于个人家庭而言,其迁移选择应该是最适合其需要的公共产品提供地区。有关世界各国的实证研究表明,即便是在区域差距很小的发达国家,这种为教育而流动的机制也是客观存在的。如 Herold(2003)通过比较美国的部分州之间存在的二元化教育体制和师资力量并指出,这些因素将影响移民儿童在心理与情感上的健康发展及其父母的迁移决策。Filipa(2011)认为英国的国际移民输入会显著降低流入地的教育质量,从而导致收入较高的本地居民选择用脚投票迁往其他地区,进而对本地的教育公共服务和住房市场形成一种“消极的收入效应”。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区域差异和城乡二元结构,因而在经验研究中收入因素而非教育因素对迁移决策的影响更大。Giani(2006)通过对孟加拉国流动儿童的研究表明,随迁子女进入城市接受教育,是由于其家长进城务工后为了家庭团聚而进行选择的结果。因此,随迁子女的流向取决于父母就业的去向,毕竟外出打工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寻求一份更高报酬的就业机会。Batbaatar 等(2006)通过对蒙古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教育状况进行比较,也没有发现流入城市的儿童比留守儿童在学业发展上有显著的提高,因此说农民工是为了孩子的教育而流动缺乏起码的动力来源。然而对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后发城镇化大国而言,虽然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难以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但相对于流出地的农村教育状况而言,流入城市的教学质量和软硬件设施要更胜一筹(Donzuso 2015;Roy 等 2015)。张翼(2011)通过对 2010 年全国性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为了孩子的教育与升学”是农民工愿意转户的最主要原因,甚至要远高于“就业机会”的选择比例。Liu 和 Xing(2016)利用微观数据探讨了区域内小学数量的下降和教育政策对农村居民迁移决策的影响。通过探索异质性的影响,可以看出有适龄儿童的家庭对小学搬迁更加敏感,而且这种效果对拥有男孩的家庭而言更加明显。由此该文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机和区域教育政策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日本学者境野健儿(2007)认为,农民工以及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如果各级政府将工作重心放在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上,那么解决得越好的城市就会面临越多的外来农民工子女。事实上,国内学者和教育管理部门已经认识到了这种教育公共服务的“洼地效应”问题(吴瑞君 2012)。据上海市教委 2011 年资料显示,在沪接受义务教育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仅 2010 年就增加 5.76 万人,甚至高于前四年的累计增量 3.97 万人。随着杭州湾大桥的开通,教育开放程度较高的长三角南部城市“洼地效应”也开始凸显。

综合来看,已有的文献大多在经验层面上讨论了教育与迁移决策的关系问题,但是对于“为教育而流动”的作用机制,以及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洼地效应”的存在证据仍然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数据可得性有很大关系,因为既要获取父母迁移的大样本微观数据库,又需要对随迁子女的人口学特征有一个全面的信息掌握是十分困难的。有鉴于此,本文将以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和随迁子女教育均衡政策改革为基础构建分析框架,力求为这种新迁移模式提供科学依据和有价值的政策启示。

### 三、政策回顾与研究设计

关于随迁子女教育均衡政策改革对劳动力流动影响机制的定量研究,必须对全国及地方性改革的时间、内容和改革力度有较为详细的掌握。为此,本文主要针对全国和代表性省份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和文件进行归纳梳理,再根据入学程序减免、准入门槛降低、财政投入增加等具体改革进展指标来分类确定有典型意义的研究省份和对照省份,从而构建以准自然实验为基础的政策评估及分析框架。

#### (一) 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回顾

从全国层面来看,随迁子女教育政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无专门政策、无经费规定时期。1986年实施义务教育后的长时期内,义务教育制度是区县及以下政府的责任。但是由于《义务教育法》颁布的1986年以前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因此没有做任何相关规定。1992年后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外来务工人员数量急速增加,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也逐渐凸显。然而在这期间,中央政府没有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出台任何专门政策(韩嘉玲,2001)。(2)“两为主”政策形成但政府责任不明确时期。1996年4月,国家教委制定了《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试行)》。文件提出,流入地政府要为流动人口中的适龄儿童、少年提供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具体承担管理职责,但该文件没有对政府承担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经费做任何规定。2001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提出“要重视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3)明确政府财政责任但各级政府之间责任不明确时期。200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除了继续强调“两为主”政策外,还第一次规定了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经费负担做出了规定,也明确了地方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财政责任。然而,对哪一级地方政府负主要责任、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如何分担经费责任没有明确规定。(4)从“两为主”到“两纳入”的改革攻坚时期。《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出台以后,国务院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旨在解决和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的政策文件。除了进一步明确“两为主”外,还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将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但具体落实到各级政府层面,仍然有些地方处于半明确、半模糊的状态。

从省级层面来看,由于各地的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因而在对待随迁子女教育均衡政策改革上力度有别,这也为我们下一步使用双重差分法提供了先决条件。基于有据可查的资料,我们对各地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力度按照程序减免、准入门槛降低、财政投入增加三个中间变量来进行评估(见表1)。编码A表明该地随迁子女入学的程序有了明显的减少,只要持有就业证就可以让孩子就近入学;编码B表明该地对缴纳社保的年限小于或等于1年,随迁子女入学的准入门槛大幅度降低;编码C表明该地用于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经费每年增加了10%以上。通过中间变量和结果变量的省级层面比较,我们发现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之间差异十分明显,主要是

由绝大部分农民工及随迁子女集中在沿海地区所致。因此,为了提高研究的针对性和匹配度,本文将研究省份和对照省份样本主要选定在沿海地区。

表 1 随迁子女教育政策分类标准

	随迁子女政策改革	编码	说明
中间 变量	程序明显减免	A	外地务工人员办理暂住证的同时,可办理随迁子女入学登记卡,在“免试就近入学”原则下,随迁子女入学程序大大简化
	准入门槛大幅降低	B	入学条件已经将初期的“六证”调整为“两证”,即父母的农民身份证明、居住证(投靠类或就业类)或就业证明,社保缴纳年限进一步降低
	财政投入显著增加	C	财政每人每年拨付经费用于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增加专项用于改善接收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入学学校的办学条件
结果 变量	随迁子女数量增加	D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接收随迁子女就读数量快速增加
	公办学校接收比例	E	公办中小学接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比例
	生均随迁子女财政支出	F	财政支出用于每名随迁子女的平均额度

## (二) 研究框架设计

由于本文主要采用双重差分法来考察随迁子女教育均衡政策改革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以及“为教育而流动”的作用机制,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根据改革的时间和力度,将沿海省份划分为处理组和控制组。考虑到 2010 年《纲要》出台以后,部分沿海省市相继在 2011 年跟进落实了一系列差异化的随迁子女教育改革政策。<sup>①</sup> 直至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后,这些地方性的试点改革开始在全国层面铺开。<sup>②</sup> 因此,本文将 2011 年前后发生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的沿海省份作为处理组,其他改革力度较弱的沿海省份作为控制组,并综合考虑表 1 的中间变量和结果变量分类标准以及地理区位,将处理组与控制组的省级行政单位进行匹配。其中,处理组的研究省份包括福建、江苏、山东、河北和辽宁,控制组的对照省份分别选取广东、浙江、北京、天津和广西。<sup>③</sup> 同时在数据处理中,我们以地方性改革集中出台的 2011 年为时间节点,设定 2010 年为事前组、2012 年为事后组,模型估计方法如下:

$$ATT_{DID} = E(M_1^T - M_0^T | D = 1) - E(M_1^C - M_0^C | D = 0)$$

① 受文章版面和篇幅所限,关于研究省份与对照省份随迁子女教育改革情况的具体资料未在正文中呈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② 如《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 2012 年工作要点》指出,将常住人口全部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将随迁子女全部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电子学籍管理系统,简化入学手续,支持规范民办随迁子女学校发展,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2012 年 8 月教育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2012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③ 值得说明的是,上述省份分类标准是指在考察期间内是否有明显的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而并非代表了各省在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方面的总体进程。同时,虽然各省有部分地区没有进行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但本文仍然使用全省流动农民工数据进行政策影响分析。有两点原因可以使得此做法不至于产生有偏的估计结果:第一,如果随迁子女政策改革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较大,那么示范效应和预期效应可能使省内其他未改革市区的劳动力产生一定程度的流动效应;第二,部分随迁子女改革较多涉及省内大城市和重点城市(如江苏省),如果改革市劳动力流动较明显,由于其农民工和随迁子女数量占全省比重较高,因而对全省的改革效应贡献权重较大。

其中  $D$  为是否发生随迁子女政策改革的虚拟变量(1 为发生 0 为未发生),  $M_0$  和  $M_1$  分别是事前组和事后组的农民工流入虚拟变量, 上标  $T$  和  $C$  分别标记为处理组和控制组。等式右边两大项是个体自身的第一次差分, 从而消除处理组和控制组自身的变化趋势; 而这两者之间的再次差分, 则是在控制时间变化趋势和一些随时间同步变化因素的同时, 得出的政策本身所带来的效果, 即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对劳动力流动的净影响。

本文的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库。从现有研究来看, 该数据库是目前涵盖范围最广, 覆盖流动人口个体和家庭的人口学特征、就业状况及随迁子女信息的大样本动态微观数据库。自 2009 年开始, 国家卫生计生委每年组织专业调查队伍对全国的流动人口信息进行专门跟踪调查。在数据调查过程中, 使用了分层线性随机抽样的方法来获取样本, 要求访谈员入户并询问他们关于个体与家庭的相关信息。而在本文研究中, 我们可以使用 2010 年和 2012 年两年的调查数据, 采用双重差分法来估计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对农民工迁移决策的影响。在获取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前, 我们还对样本进行了一定的预处理。首先, 为了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文献保持一致, 我们把劳动力样本限定在年龄为 16~64 岁的人群, 同时将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年龄设定为 7~15 岁; 其次, 为了能严格使用双重差分法, 我们剔除研究省份个别城市在两年都发生政策变化的样本。在此基础上, 我们还对样本作了权重调整。因为我们获取的数据并不是在全国范围内的所有县乡调查, 而是选择了部分城市和县区作为分层抽样的样本, 所以我们采用 3 级权重指标(省份、地市、县区)对样本进行权重调整从而让它具有全国层面的代表性。

#### 四、实证研究

##### (一) 模型与变量设定

为了检验“洼地效应”的存在依据以及刻画“为教育而流动”的作用机制, 必须首先对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进行适当控制。新古典迁移理论认为, 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市的预期高收入与平均失业率水平是影响剩余劳动力迁移决策的主要原因(Lewis, 1954)。随着新迁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劳动力个体的教育水平、年龄、婚姻等特征对迁移决策的影响开始逐渐凸显。Melzer (2013) 通过对德国的经验研究显示, 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个体更有可能产生迁移行为。Zhu (2002)、Zaiceva 和 Zimmermann (2008) 还发现, 诸如年龄、性别和婚姻因素在劳动力迁移决策中的作用也非常明显。针对中国的相关领域研究还显示, 家庭规模和被抚养人口是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原因, 而随迁子女能够被流入地公办学校接纳的重要条件又包括职业的稳定性、正规住房和本地户口等(Liang 等 2008; Donzuso 2015)。在综合考虑前人研究、数据可得性以及排除变量间相关性的基础上, 设定基础回归方程式如下:

$$Probit_{mig} = \alpha_0 + \alpha_1 \times decision + \alpha_2 \times year + \alpha_3 \times decision\_year + \sum \beta_i IND_i + \sum \gamma_j FAM_j + \mu$$

其中, 因变量  $Probit_{mig}$  为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后, 农民工是否流向改革省份。 $decision$  为是否参与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的哑变量,  $year$  为改革前后的时间哑变量,  $decision\_year$  代表是否参与改革省份与改革前后时间哑变量的交互项。为了控制其他可能因素的干扰, 从而分离出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这一外部事件对农民工流动的净影响, 我们参考新古典迁移理论和新迁移经济学的既有文献, 控制了影响农民工流动的其他个体特征、家庭因素以及一些政策的异质性影响。

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将进一步考察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的异质性以及“为教育而流动”的作用机制。为此,我们在基础回归方程式的形式上进行如下拓展:(1)自变量中纳入家庭是否拥有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的虚拟变量 *kid\_withd* 以及政策净效应变量与拥有适龄儿童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policy\_kid\_withd*; (2)自变量中纳入随迁子女是否允许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虚拟变量 *upgrade*, 以及政策净效应变量与随迁子女异地高考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policy\_upgrade*; (3)考察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对农民工迁移距离 *mig\_scope* 的影响; (4)考察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前后职业稳定性 *Probit<sub>formal\_occup</sub>* 的变化; (5)测度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前后小时工资 *wage\_hourly* 的变化。具体指标和变量定义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定义

变量	定义	代码
因变量	2011 年研究省份随迁子女政策改革后,农民工是否流向改革省份	<i>Probit<sub>mig</sub></i>
	是否从事稳定职业(是 = 1,否 = 0)	<i>Probit<sub>formal_occup</sub></i>
	小时工资(元)	<i>wage_hourly</i>
	本次流动范围(跨省流动 = 1,省内跨市 = 2,市内跨县 = 3)	<i>mig_scope</i>
解释变量 (政策效应)	随迁子女教育政策的净影响(政策对结果变量的影响)	<i>decision_year</i>
	是否参与了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虚拟变量,是 = 1,否 = 0)	<i>decision</i>
	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前后虚拟变量(是 = 1,否 = 0)	<i>year</i>
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	性别(男 = 1,女 = 0)	<i>gender</i>
	年龄	<i>age</i>
	受教育年限	<i>education</i>
	受教育程度为研究生,对照组是文盲	<i>edu1</i>
	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对照组是文盲	<i>edu2</i>
	受教育程度为大学专科,对照组是文盲	<i>edu3</i>
	受教育程度为中专,对照组是文盲	<i>edu4</i>
	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对照组是文盲	<i>edu5</i>
	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对照组是文盲	<i>edu6</i>
	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对照组是文盲	<i>edu7</i>
控制变量 (家庭变量)	外出打工的经历(有 = 1,否 = 0)	<i>mig_exp</i>
	家庭是否有需要赡养的老人(有 = 1,否 = 0)	<i>old_with</i>
	户口性质(城市 = 1,农村 = 0)	<i>hukou</i>
	政策改变前在流入地是否拥有住房(是 = 1,否 = 0)	<i>housing_stay</i>
	家庭月净收入(家庭月收入减去生活消费支出)(千元)	<i>n_income</i>

## (二) 共同趋势检验

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我们首先利用权重调整后的省级层面数据对发生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的省份(包括福建、江苏、山东、河北、辽宁)以及改革力度较弱的对照省份(包括广东、浙江、北京、天津和广西)的农民工流动趋势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自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的近几年内,由于



沿海地区进出口加工企业大量倒闭减产,导致不论是处理组还是控制组沿海省份,总体上均出现了相同的农民工小幅返乡的回流态势。在数据上主要体现为流入处理组和控制组省份的农民工比例均呈现相近的小幅回落态势,总体上满足双重差分估计的共同趋势假设。在本文重点观测的改革前后时段内(2010-2012年),虽然处理组和控制组省份总体上都面临着相同的农民工小幅回流压力,但在改革力度较弱的控制组省份中,农民工回流的比例为1.1%;而在发生了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的处理组中,农民工回流的比例仅为0.5%。也就是说,相对于控制组而言,2010-2012年间处理组的农民工回流幅度要低0.6%。由这些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对于稳定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安居乐业发挥了一定作用,在省级加总指标上对劳动力流动的数量和方向产生了显著影响。但是,由于没有控制流动人口个体和家庭等其他特征信息,基于省级层面的加总数据得出的分析结论只能作为一个初步的统计推断。

### (三) 计量结果与分析

进一步,我们利用微观数据来考察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通过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使得农民工流向改革省份的概率大为增加。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越是加大对随迁子女教育政策的改革力度并放松入学的限制门槛,就会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流向该地区,从而“洼地效应”就越明显。其他控制

表3 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模型 变量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i>Probit<sub>mig</sub></i>		<i>Probit<sub>mig</sub></i>		<i>Probit<sub>mig</sub></i>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i>decision_year</i>	0.997***	(0.004)	0.998***	(0.004)	0.995***	(0.004)
<i>decision</i>	-0.126***	(0.002)	-0.127***	(0.002)	-0.123***	(0.002)
<i>year</i>	-0.279***	(0.001)	-0.280***	(0.001)	-0.271***	(0.001)
<i>n_income</i>			0.001**	(0.000)	0.001***	(0.000)
<i>gender</i>			0.004	(0.002)	0.007***	(0.002)
<i>age</i>			0.001***	(0.000)	0.001***	(0.000)
<i>edu1</i>			0.090***	(0.029)	0.094***	(0.028)
<i>edu2</i>			0.079***	(0.027)	0.083***	(0.027)
<i>edu3</i>			0.087***	(0.027)	0.090***	(0.027)
<i>edu4</i>			0.062**	(0.027)	0.064**	(0.027)
<i>edu5</i>			0.083***	(0.028)	0.084***	(0.028)
<i>edu6</i>			0.067**	(0.028)	0.066**	(0.028)
<i>edu7</i>			0.050*	(0.028)	0.049*	(0.028)
<i>mig_exp</i>					-0.004***	(0.000)
<i>old_with</i>					-0.016***	(0.004)
<i>hukou</i>			0.009**	(0.004)	0.004	(0.004)
<i>housing_stay</i>					0.027***	(0.004)
<i>Constant</i>	561.905***	(2.385)	562.800***	(2.447)	545.664***	(2.594)
<i>Observations</i>	95020		94734		94734	
<i>R-squared</i>	0.488		0.488		0.490	

注:\*\*\*、\*\*和\*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变量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包括:(1)反映家庭实际收入水平的月净收入(家庭月收入减去生活消费支出)越高,农民工迁移到改革省份的概率也越高。实际收入水平在农民工的迁移决策中仍发挥一定作用,这也符合新古典迁移理论的基本判断。(2)在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方面,男性农民工的迁移动机要显著高于女性农民工,年龄越大的农民工对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也更为敏感,迁移概率也越大;而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农民工由于个体流动性较大,子女和家庭随迁的比例较小,因而做出的迁移决策也更为理性慎重,这与新迁移经济学的若干经验研究结论也是基本一致的。(3)值得一提的是,农民工自身的受教育程度与对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的敏感度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越大并且显著性更高。这表明农民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受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影响而迁移到改革省份的概率也越大。(4)其他家庭特征对迁移决策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拥有当地户籍或固定住房会进一步增加农民工流向改革省份的概率,而在流出地有老人需要赡养的家庭会显著降低农民工自身的迁移动机。

## 五、稳健性检验

### (一) 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的异质性检验

根据前文分析,我们已经初步检验了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的“洼地效应”,经历过政策改革的沿海省份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越大。但是,我们仍需要进一步甄别这种向改革省份的流动机制是否由其他非教育因素导致,以及教育因素在农民工的迁移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接下来将分三步对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的异质性进行检验:(1)考虑到随迁子女中7~15岁的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家庭会对政策更为敏感,并且这一年龄段儿童是当前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主要群体,因此我们在异质性检验中纳入家庭是否拥有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的虚拟变量,来观测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对是否拥有适龄儿童家庭所带来的不同净影响。(2)有部分学者认为,随迁子女是由于更多的流动人口进城工作而相应产生的,而并非更好的教育政策带来的结果。除非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可以就地参加升学考试,否则很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洼地效应”。为了剔除教育与迁移决策的相互影响问题,我们进一步区分了在本文政策观察期内,改革省份中是否可以让随迁子女参加异地高考的虚拟变量。<sup>①</sup>(3)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要素间的相互作用通常符合距离衰减规律,随着距离增加,劳动力的迁移概率会随之降低。也就是说,劳动力一般会倾向于迁移到离家较近的地区。为此,我们在基础回归方程式中纳入农民工本次流动范围的虚拟变量 *mig\_scope* (跨省流动=1,省内跨市=2,市内跨县=3)来考察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对农民工迁移距离的影响。

从异质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1)对于拥有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的家庭而言,其农民工父母的迁移动机由于顾及孩子的抚养和教育问题而显著降低。但在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的冲击下,政策交互项 *policy\_kid\_withd*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有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的家庭,在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后流入改革省份的概率显著增加。也就是说,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对有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的家庭流动具有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2)通过纳入异地高考虚拟

<sup>①</sup> 在2010年12月启动的国家教改试点中,山东、湖南、重庆被确定为首批异地高考试点省市。虽然山东实行异地高考有两年政策缓冲期,但是作为国家首批异地高考试点省份的政策预期实际已经产生,这对于随迁子女教育均衡政策改革而言无疑是极为关键的一环。为此,我们进一步纳入是否可以让随迁子女参加异地高考的虚拟变量,以便与其他改革省份进行区分。

表 4 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的异质性检验

模型 变量名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i>Probit<sub>mig</sub></i>		<i>Probit<sub>mig</sub></i>		<i>mig_scope</i>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i>decision_year</i>	0.996***	(0.003)	0.080***	(0.002)	-0.021***	(0.003)
<i>decision</i>	-0.074***	(0.002)	0.001	(0.002)	-1.304***	(0.002)
<i>year</i>	-0.244***	(0.002)	-0.038***	(0.001)	0.019***	(0.001)
<i>kid_withd</i>	-0.007***	(0.003)				
<i>policy_kid_withd</i>	0.074***	(0.004)				
<i>n_income</i>	0.001***	(0.000)	-0.000	(0.000)	-0.002***	(0.000)
<i>gender</i>	0.003	(0.002)	-0.001	(0.001)	0.002	(0.002)
<i>age</i>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i>edu1</i>	0.043	(0.028)	0.020*	(0.012)	0.037	(0.024)
<i>edu2</i>	0.034	(0.026)	0.024**	(0.012)	0.046**	(0.023)
<i>edu3</i>	0.040	(0.026)	0.026**	(0.011)	0.061***	(0.023)
<i>edu4</i>	0.021	(0.026)	0.019	(0.011)	0.057**	(0.023)
<i>edu5</i>	0.031	(0.027)	0.018	(0.012)	0.059**	(0.023)
<i>edu6</i>	0.008	(0.027)	0.015	(0.012)	0.048**	(0.023)
<i>edu7</i>	0.001	(0.027)	0.008	(0.012)	0.043*	(0.024)
<i>mig_exp</i>	-0.003***	(0.000)	-0.001***	(0.000)	-0.002***	(0.000)
<i>old_with</i>	-0.018***	(0.004)	0.001	(0.002)	0.004	(0.003)
<i>hukou</i>	0.002	(0.003)	0.007***	(0.002)	0.004	(0.003)
<i>housing_stay</i>	0.022***	(0.003)	0.015***	(0.002)	0.064***	(0.003)
<i>upgrade</i>			-0.919***	(0.002)		
<i>policy_upgrade</i>			0.916***	(0.010)		
<i>Constant</i>	491.696***	(4.040)	77.821***	(1.450)	-36.004***	(2.214)
<i>Observations</i>	72982		68406		94734	
<i>R-squared</i>	0.605		0.926		0.828	

变量的政策交互项 *policy\_upgrade* 回归结果也表明,即便是相对于其他实行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的省份,允许随迁子女参加异地高考对农民工家庭的吸引力更大,流入异地高考改革试点省份的概率也明显增加。所以综合来看,允许农民工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是目前为止改革效果最明显的一项教育均衡政策。(3)按照劳动力流动的一般规律,农民工会优先选择离家较近的地区务工,迁移距离越小迁移概率越大,即跨省流动概率 < 省内跨市流动概率 < 市内跨县流动概率。但是模型 6 中随迁子女教育政策的净影响 *decision\_year* 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显著改变了农民工的迁移距离。<sup>①</sup> 为了保证其随迁子女异地入学,农民工父母宁愿迁移到更远的地区去寻求更加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sup>①</sup> 由于劳动力迁移距离越小,迁移概率越大,所以我们沿用一般问卷调研设置农民工流动范围的虚拟变量,跨省流动 = 1, 省内跨市 = 2, 市内跨县 = 3, 迁移距离越近数值越大。*decision\_year* 回归系数为负表明,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后,农民工越来越不愿意近距离迁移,而更加倾向于远距离迁移。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中国的行政区划可能存在跨省比跨市的距离更短的情况,如安徽的滁州和马鞍山,离江苏省会南京的距离比安徽的省会合肥更近,但是由于我国的行政区划普遍存在边界效应,跨省迁移的难度一般会高于省内迁移,所以本文选择按“跨省流动 = 1, 省内跨市 = 2, 市内跨县 = 3”的方式设置迁移距离的虚拟变量。

(二) “为教育而流动”的作用机制

国内外诸多相关研究表明,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并不只是局限于教育领域(Donzuso 2015)。如在我国许多地方,若要随迁子女能够顺利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就读,其父母职业的稳定性和收入水平就是重要条件之一(Liang 等 2008)。根据劳动经济学理论,在提高职业稳定性基础上,补偿性工资水平可能会出现下降。因此,我们进一步检验了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对农民工职业选择和小时工资的影响。同时,根据 Zhu(2002)等人的研究,年龄因素与劳动力流动、就业稳定性和收入水平之间可能存在“倒 U”型关系,为此,我们在前文模型基础上控制了年龄的平方项,以此来综合考察“为教育而流动”的作用机制。

表 5 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对农民工职业选择和小时工资的影响

模型 变量名	模型 7		模型 8	
	<i>Probit<sub>formal_occup</sub></i>		<i>wage_hourly</i>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i>decision_year</i>	0.062***	(0.003)	-2.132***	(0.312)
<i>decision</i>	0.020***	(0.002)	3.240***	(0.173)
<i>year</i>	0.079***	(0.001)	6.534***	(0.097)
<i>gender</i>	0.005**	(0.002)	7.237***	(0.172)
<i>age</i>	0.005***	(0.001)	1.652***	(0.065)
<i>age<sup>2</sup></i>	-0.000***	(0.000)	-0.022***	(0.001)
<i>education</i>	0.051***	(0.001)	2.666***	(0.082)
<i>mig_exp</i>	0.001***	(0.000)	0.181***	(0.016)
<i>hukou</i>	0.049***	(0.003)	2.807***	(0.262)
<i>housing_stay</i>	0.036***	(0.003)		
<i>Constant</i>	-158.842***	(2.062)	-13161.016***	(194.108)
<i>Observations</i>	94947		87695	
<i>R-squared</i>	0.153		0.125	

观察表 5 中职业选择方程的交叉项系数可以发现,在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的影响下,从事稳定职业的农民工比例显著提高,表明在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后,农民工为了让其子女能够满足流入地公办学校的基本入学要求,从而积极争取获得一份更加稳定的职业。由小时工资方程的交叉项系数也可以发现,在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后,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出现了显著下降,表明农民工在提高职业稳定性的同时,也历经了小时工资下降的过程。年龄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回归系数显示,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加,职业的稳定性和小时工资都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变化趋势。综合表 5 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为教育而流动”的作用机制:由于进行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的地区一般会要求农民工在流入城市有稳定工作和缴纳社保年限,所以为了保障子女的教育权益,农民工宁愿以牺牲部分工资收入为代价来获得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从而换取其随迁子女入读公办学校的机会。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新迁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的回顾与梳理,利用国家卫生计

生委的微观数据分析了不同地区随迁子女教育政策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从准自然实验视角提供了地方政府关于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洼地效应”的证据以及“为教育而流动”的作用机制。分析结论认为,随迁子女教育均衡政策的出台会吸引更多的外来学龄儿童进入改革省份入学,并且改革力度越大、对随迁子女入学的门槛越低、升学的限制条件越小,对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吸引力就越大。相对于其他教育均衡政策而言,异地高考试点对农民工流向的影响更加明显。伴随着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实施,农民工家庭的迁移距离也随之增加。由于进行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的地区一般会要求农民工在流入城市有稳定工作和缴纳社保年限要求,为了保障子女的受教育权益,农民工宁愿以牺牲部分工资收入为代价来获得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从而换取其随迁子女入读公办学校的机会。

上述研究结论的背后也蕴含了丰富而有价值的政策信息。中国当前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加速进程之中,迁移模式已经由传统的劳动力个体迁移逐渐向家庭式迁移转变,以家庭收益最大化和家庭风险最小化为基本假设的新迁移经济学理论更加符合当前中国的人口迁移特点。中国的新型城镇化离不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更离不开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和随迁子女的教育均衡政策改革。然而,在当前国家层面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逐步深化的背景下,具体由哪一级地方政府负责、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如何分担支出责任等问题依然处于半明确、半模糊的状态。许多地方政府依然担心,大力推进随迁子女教育均衡政策后,是否会吸引更大规模的外地随迁子女前来入学,从而引发典型的“洼地效应”问题。如果仅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考虑,消极应对改革或者为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提供有限的教育条件将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但就全国层面来看,地方政府的这种自利行为将会带来巨大的福利和效率损失,导致新型城镇化动力不足和社会再度分割。

为此,我们认为,要从新型城镇化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协同推进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特别是要坚持“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前提下,将随迁子女教育纳入国家和地方财政保障范围,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在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上的主体责任,并明确、细化各级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针对不同地区流动人口随迁子女规模及地方财力情况,考虑在人均公用经费、基建经费等方面实施不同比例的分担机制。在原则上不改变现有“分级负责、以县为主”的城乡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前提下,由中央财政统筹,按动态性学籍对包括随迁子女在内的义务教育学生进行人头拨款,在学龄儿童迁移行为发生时实行“钱随人动”。与此同时,在城镇规划和土地出让时,必须保障随迁子女集中地区相对均衡的师生比和教育用地,明确随迁子女就近入学的义务教育学校;对于公办学校学位不足的地区,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安排随迁子女在普惠性民办学校就读;实现公办学校混合编班和统一管理,促进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学校和社区的完全融入。最后,我们也认识到,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更深层次原因还是在于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要彻底消除隐藏在户籍背后的身份差异和基本权利不平等,仍将是我国深化体制改革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关键和长期任务所在。

参考文献:

1. 韩嘉玲:《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状况调查报告(续)》,《青年研究》2001年第9期。
2. 境野健儿:《日本学者看中国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网站,2007年11月10日。
3. 吴瑞君:《外来人口聚居区的教育问题及其管理创新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4. [美]约翰·弗农·亨德森、[比]雅克-弗朗索瓦·蒂斯:《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4卷):城市和地理》,郝寿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5. 张翼:《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镇化道路的选择》,《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2期。
6. Bakker, C., Elings-Pels, M., & Reis, M.,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Children in the Caribbean. <http://www.unicef.org/>

easterncaribbean/Impact\_of\_Migration\_Paper.pdf 2009.

7. Batbaatar M. , Bold , T. , & Marshall , J. , Children on the Move :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Access to Education in Mongolia. *Childhood Poverty Research & Policy Centre* 2006.
8. Chen , Y. , & Feng , S. , Access to Public Schools and the Educ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 Vol. 26 , No. 1 , 2013 , pp. 75 – 88.
9. Chetty , R. , Hendren , N. , & Katz , L. , Th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Better Neighborhoods on Children: New Evidence from the Moving to Opportunity 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l. 106 , No. 4 , 2016 pp. 855 – 902.
10. Das , S. , & Das , M. , Income , Migration and Social Adjustment of the Tribal People in Tripura: A Case Study of the “Tripuri” Tribe. *Space and Culture* , Vol. 2 , No. 1 , 2014 pp. 5 – 12.
11. Donzuso , N. N. , 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 in Education for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Global Social Welfare* , Vol. 2 , No. 1 , 2015 pp. 1 – 5.
12. Filipa , S. , Immigration and House Prices in the UK , Discussionpaper series // Forschungsinstitut zur Zukunft der Arbeit , No. 5893 , <http://nbn-resolving.de/urn:nbn:de:101:1-201108093247> 2011.
13. Giani , L. , Migration and Education: Child Migrants in Bangladesh. Sussex Migration Working Paper , No. 33. Sussex Centre for Migration Research , University of Sussex , UK. March 2006.
14. Herold , M. , *Issues in Latino Education: Race , School Culture , and the Politics of Academic Success*. New York : Allyn and Bacon , 2003.
15. ILO & UCW , Joining Forces against Child Labor: Interagency Report for the Hague Global Child Labor Conference of 2010 , Geneva , 2010.
16. Katz , L. , Kling , J. , & Liebman , J. , Moving to Opportunity in Boston: Early Results of a Randomized Mobility Experi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Vol. 116 , No. 2 , 2001 , pp. 607 – 654.
17. Leventhal , T. , & Brooks-Gunn , J. , The Early Impacts of Moving to Opportunity on Children and Youth in New York City , Mimeo Columbia University Teachers College , Center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 2002.
18. Lewis , A. W. ,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 Vol. 22 , No. 2 , 1954 pp. 139 – 191.
19. Li , H. , Prashant , L. , Scott , R. , Wu , B. , & Xie , J. , Unequal Access to College in China: How Far Have Poor , Rural Students Been Left Behind? *The China Quarterly* , Vol. 221 , 2015 , pp. 185 – 207.
20. Liang , Z. , Guo , L. , & Duan , C. , Migration and the Well-being of Children in China. *The Yale-China Health Journal* , Vol. 5 , 2008 pp. 25 – 46.
21. Liu J. , & Xing , C. , Migrate for Education: An Unintended Effect of School District Combination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 Vol. 40 , 2016 pp. 192 – 206.
22. Ludwig , J. , Duncan , G. & Hirschfield , P. , Urban Poverty and Juvenile Crime: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Housing-mobility Experi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Vol. 116 , No. 2 2001 pp. 655 – 680.
23. Melzer , S. , Reconsidering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East-West Migration in Germany.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 Vol. 29 , No. 2 2013 pp. 210 – 228.
24. Rosenbaum , E. , Changing the Geography of Opportunity by Expanding Residential Choice: Lessons from the Gautreaux Program. *Housing Policy Debate* , Vol. 6 , No. 1 , 1995 pp. 231 – 269.
25. Roy , D. , Singh , P. , & Roy , U. , Impact of Rural-Urban Labor Migration on Education of Children: A Case Study of Left Behind and Accompanied Migrant Children in India. *Space & Culture India* , Vol. 2 , No. 4 , 2015 pp. 17 – 34.
26. Sampson , R. , Moving to Inequality: Neighborhood Effects and Experiments Meet Social Struc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Vol. 114 , No. 11 , 2008 , pp. 189 – 231.
27. Scalabrini Migration Center , Hearts Apart: Migration in the Eyes of Filipino Children. Manila: Episcopal Commission for the Pastoral Care of Migrants and Itinerant People-CBCP / Apostleship of the Sea-Manila , 2004.
28. Smita , Distress Seasonal Migration and Its Impact on Children’s Education. Creative Pathway’s to Access , Research Monograph , No. 28. NUEPA. Retrieved from <http://sro.sussex.ac.uk/1869/> 2008.
29. Stark , O. , & Bloom , D. ,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l. 75 , No. 2 , 1985 pp. 173 – 178.

30. Tiebout , C. M. ,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Vol. 64 , No. 5 ,1956 , pp. 416 – 424.
31. UNICEF & SU-SSC , Children and Migration for Every Child Health , Education , Protection. Advance Humanity. Retrieved from [http://www.globalmigrationgroup.org/uploads/gmg-topics/children/3\\_B\\_Policy\\_brief\\_children\\_migration\\_June07.pdf](http://www.globalmigrationgroup.org/uploads/gmg-topics/children/3_B_Policy_brief_children_migration_June07.pdf) 2006.
32. Vladicescu N. , Cantarji V. , & Jigau , I. ,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on Communities , Families and Children in Moldova*. UNICEF Division of Policy and Practice , New York 2008.
33. Xiong , Y. , The Broken Ladder: Why Education Provides No Upward Mobility for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 Vol. 221 , 2015 pp. 161 – 184.
34. Xu S. , Zhu , H. , & Li , X. , Who had to Leave Their Children Behind? Evidence From a Migrant Survey in Shanghai. *Hiroshima Journal of Economics* , Vol. 54 , No. 1 2013 , pp. 39 – 50.
35. Zaiceva , A. , & Zimmermann K. , Scale , Diversity and Determinants of Labor Migration in Europe.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 Vol. 24 , No. 3 , 2008 pp. 427 – 451.
36. Zhang , D. , Li , X. , & Xue , J. , Education Inequality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Migrants’ Children Education , and Some Implications.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 Vol. 32 , No. 1 2015 pp. 196 – 224.
37. Zhu , N. , The Impacts of Income Gaps o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 Vol. 13 , No. 2 – 3 , 2002 , pp. 213 – 230.

## **Migrate for Education? The Impact on the Flow of Migrant Workers by Migrant Children’ Education Policies Reform**

LI Chao(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 ,CASS ,10028)

WAN Haiyua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100875)

TIAN Zhilei(Peking University ,100871)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migration patterns and mechanism of “migrate for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igrant children’ education policies reform.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generous education policies of migrant children in reformed provinces could attract more migrants. If the region doing greater reform effort , reducing more enrolling threshold and cutting down more upgrade restrictive conditions ,it will attract more and more migrants and their children. Compared with other education balance policy , migrant children to sit Gaokao in cities take more obvious influence on flow of migrant worker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education policies reform , the distance of migrant workers family also has been increased.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region’ s rules to allow their children to be enrolled into the local school , migrant parents try to find a stable job with less wage level in the labor market. To a certain extent , this reform can reduce the mo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children obviously. Therefore , Chinese government must put more attention to this new family migration pattern in current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 and public service policies such as education field have also been reformed.

**Keywords:** Migrant Children , Education Policies , Migration Motivation , Lowland Effect

**JEL:** H52 , I28 , J61

责任编辑: 汀 兰